

# 教育能否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

## ——基于代际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

叶晓梅

**[摘要]** 在中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代际互换视角，深入分析教育获得对个人养老质量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2015年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教育获得会通过当期与长期的代际交换增加个体的养老质量。一方面，受教育水平会对老年人的健康、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和财富保证个体对子女当期的时间和经济支持，增加了子女对父母养老支持，进而双重提升养老质量。另一方面，教育获得的代际效应使得教育水平较高者更愿意投资子女教育，而教育作为收入和孝敬观念提升的关键途径，增强了子女的养老能力和意愿，进而增进父代的养老质量。同时发现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健康的正向影响更大，而代际照料孙辈则可能降低父母的养老质量。因此，在重视教育对代际社会交互养老影响的良性循环机制时，需关注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和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并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以优化代际交互支持的协作方式。

**[关键词]** 教育获得；养老质量；代际养老；社会交互理论

### 一、引言

教育和养老是家庭投资的重要方面，在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下，个体及子女教育获得水平能否增加中国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一直备受关注。据统计，至2015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为14.3%，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在“未富先老”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限的社会养老资源并不能为涌现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收稿日期]** 2019-04-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及贡献研究”(15JZD040)

**[作者简介]** 叶晓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地址：iikeer@163.com。

提供充分的保障。同时,少子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老人孤独问题严重,儿女的情感支持是保障养老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养老不可替代的(Zhen, Silverstein, 2008; 刘西国, 2016)。因此,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养儿防老机制仍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方面。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时代,养老负担加重使得优良家庭养老系统难以维持。而教育作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和子女能力投资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带来养老的物质、精神文化和健康收益,还能通过提升子女的物质和精神慰藉的养老回报,进而成为增强家庭养老能力、减少老人孤独的重要因素。如何发挥其在家庭养老中的润滑剂作用,对于促进家庭养老系统的平衡和优化十分重要。基于互惠和均衡是一切交换关系维持的基础,本文期望深入分析教育在家庭代际社会互换系统中的作用,以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

从代际优势累积的视角来看,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存在着代际社会交互的过程。一方面,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效应使得高教育水平的父代更愿意投资子代教育,而子代教育水平的提高,能为父代养老提供必要的经济和精神支持(伍海霞, 2011)。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会给个体老年时期的身体健康、物质充裕和精神文化生活多彩带来保障(叶晓梅、梁文艳, 2016)。在青年的赡养和抚育负担加重的时代背景下,高教育水平为老人带来的健康、富有和闲暇充足,可以保证其为子女提供必要的闲暇时间和金钱支持,以保障子女安心发展事业,同时也能增加自身价值感和子女的养老支持(Hjälrm, 2012; Momtaz et al., 2014)。因此,从代际社会交互角度分析教育获得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对优化家庭内部投资、促进家庭代际优势累积和应对老龄化问题意义重大。

但已有研究缺乏关注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关于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货币收益,较少探究教育的非货币性终身收益(如老年生活质量)和代际收益(如养儿防老)。在老龄化加剧和老年孤独问题增加的背景下,本文期望从教育终生收益和代际相互支持的角度,分析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并突破传统的物质养老的局限,系统分析当前中国背景下的教育获得、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以及代际相互支持的状况,明晰教育获得水平如何经由代际交换以增加养老质量的内在作用机制,为进一步优化家庭内部养老系统,促进养老质量提升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保障老年人的养老质量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的夙愿。其中养老质量

指老年个体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的主客观评价(Dawalibi, et al., 2014)。此外,健康状况是享有高质量生活的自然基础(Gokkaya et al., 2012)。因此,一般从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这三个维度测量养老质量(Lasheras et al., 2001; Dawalibi, et al., 2014)。关于代际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一方面会通过长期的子代教育投资以增进子代的养老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在教育水平增进老年人对子女的支持能力的基础上,经由当期的相互支持来提升其养老质量。

### (一) 社会交换理论与养老质量

社会交换理论兴起于1960年代,主要强调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将一切社会活动归结为一种交换。其中互惠和均衡是社会交换关系持续下去的核心动力,互惠代表着交换双方都能从交换关系中受益,而无论这种受益是过去/现在的,还是长期/短期的;均衡意味着交换双方在付出一定成本后,都能够从交换关系中获得个体所认可的相同回报,接受支持和给予支持。在有着“养儿防老”传统的东南亚国家中,教育与养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父子两代之间长期与当期的社会交换。关于长期的交换,由于子女是父母养老的重要保障,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投资,特别愿意投资学习能力更强的子女,以获得更好的养老支持。关于当期的交换,Donald and Mark(1992)提出了代际交换动机假说,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服务或货币交换存在着提供方与接收方之间的交换关系,提供方为接收方提供了相关服务和帮助,代际转移的接收方对提供方所提供的相关服务进行货币支付或其他回报。如江克忠等(2013)采用CHARLS2008数据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与父母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时,黄庆波等(2017)也发现年老父母照料子孙或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会增进子女对其的赡养。由此可知,在代际社会交换层面的教育与养儿防老问题上,存在着长期的交互和当期的交互。双方通过长期和当期的交换以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体现了反映了社会交换的本质。

### (二) 社会交换本质中的子代教育投资与养老质量

子代教育投资与养老质量的本质其实是长期的代际社会交换。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使得父代的教育会通过其经济地位和投资动机等多种条件,影响其子代的教育获得。反过来,子女的教育对父母的养老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教育具有代际效应,父母教育会经由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

本和投资意愿对子女的教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Black, et al., 2005)。因为, 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知识水平较高, 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 更愿意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学习指导。此外, 接受高等教育的父母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 能给孩子供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支持, 有效地投资孩子的教育, 进而对孩子的教育获得会产生重要影响(罗伯特·帕特南, 2017)。如郭丛斌和闵维方(2011)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有更强的投资意愿和能力, 其孩子获得教育成就也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 父母投资子女教育与其养老交换动机有着重要关系。一般认为子女教育水平关乎父母养老质量,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越高, 得到的养老回报就越高(伍海霞, 2011)。但关于子女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路径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教育会经由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而对父母产生影响。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子女有能力对年迈的父母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余梅玲, 2015)。但也有学者认为子女教育本身会对父母养老质量产生作用。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会给父母更多的精神慰藉和更合理的经济支持, 以提升老年父母的健康水平。如沈咪(2013)通过问卷调查对 214 名老人的研究发现, 随着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 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和经济回报显著增加。石智雷(2015)也发现重视子女教育投资能够有效提高农村父母养老质量, 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 其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也就越好。

教育的代际效应已达共识, 但是子女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在支持方式上存在分歧, 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是因为医疗改善和退休制度下, 父母相对比较健康, 期望更多的给予子女支持, 而子女简单的经济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父母的社会衰竭, 对其躯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同时, 在少子化和人口快速流动背景下, 留守老人或空巢老人更多地期望子女更多的精神关怀, 以避免社会孤独而增加养老质量。如 Silverstein 等(2008)发现子女支持可以给老人带来良好的精神状态, 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原因在于子女在提供照料过程中与父母的沟通, 有助于缓解患病老人的心理紧张。刘西国(2016)也发现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离不开子女的精神赡养, 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能改进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此背景下, 分析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影响的具体途径是重要的, 其中精神慰藉的影响效应可能更大, 但需进一步验证。基于此, 本文就教育投资与养儿防老的长期代际社会交换机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sub>1</sub>: 子代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中, 对父母的精神慰藉相对于经济支持的作用可能更大。

### (三) 社会交换本质中教育获得、代际相互支持与养老质量

教育获得与养老质量的关系不仅存在于长期的代际互换,更体现在当期的代际相互支持中,父母与子女通过当期的双方互惠以增加养儿防老保障。

首先,教育获得本身会对通过经济预算约束放松、认知丰富和社会网络资本对个体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青壮年时期的优越工作收入会以累积优势效应持续至年老时期,能保障其享有充足的医疗养老保险和优越住房等物质生活质量(Mazzonna and Fabrizio, 2014)。而其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保证其在营养和医疗保健方面有充足的投入(Adams and Scott, 2002; Doorslaer, et al., 2010; Grossman, 2015);同时也会利用健康知识指导自己的健康行为和心理,进而获得良好的健康状况(Martin, 1999; Cutler and Lleras-Muney, 2010)。此外,接受教育能给予个体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促进个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进而提升精神文化生活质量(Luccas, et al., 2011)。而教育对老年个体的经济、健康和闲暇的正向影响,是其当期给予子女支持的重要基础。

其次,为了提升自身的价值和获得子女更好的供养,老年父母会积极地为成年子女提供支持(熊波、石人炳, 2016; 黄庆波等, 2017)。一方面,老龄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担加重,接受子女经济支持,可能会损害老年人的自尊心,增加其精神负担,并不利于其生活质量的提升(Momtaz et al., 2014);相反为子女贡献晚年“余热”,能增进老人的自发性、意志力和完整性,满足其基本的心理需求与角色认同,改善其心理健康,进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刘西国, 2016)。另一方面,当前0—3岁婴幼儿的抚育存在入托难的问题,孩子照料需要家庭中的代际互助来弥补(郑丹丹、易杨忱子, 2014)。健康的父母通过代际照料孙辈,能减轻子女照料负担,为子女事业发展提供保障;这既能避免老人社会衰竭,同时还能增加子女对其经济回报(何圆、王伊攀, 2015)。即“时间—金钱”互惠模式的代际交换不但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而且也有利于老人的健康(Hjälrm, 2012)。此外,给予子女支持也是老年传承性的一种重要体现,通过与下一代分享知识和经历,其与孩子的联系会更加紧密,生活更加有意义(Momtaz et al., 2014)。

再次,虽然大多数成年子女会积极地赡养老年人,给予老年人物质、经济、情感和照料等方面的支持,以回报其早年的养育之恩。而且,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与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照看孩子、做家务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陈皆明, 1998)。结构化的代际支持对父母和子女双方的社会资本都有积极的作用,进而有利于双方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Fan, 2016)。在保障父母对其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的支持后,会增加子女对其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

和照料支持,进而使得老年父母能获得良好的营养、度过一些苦难(如疾病、亲人过世),保持身心健康(Fingerman, et al., 2015; Cheng and Cheng, 2017)。

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可能会经由保障老年个体的健康、富有和闲暇而对子女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孙辈支持,进而增加子女对其的养老支持。但已有研究仅是从教育与养老的个体路径、父母支持子代或子女养老的路径分别探析,并没有从生命周期和代际交互的角度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内在综合作用机制。同时父代给予子代的支持也存在舆论分歧,如有人认为代际照料子孙能减轻子女照料负担(郑丹丹、易杨忱子, 2014),但有人却认为代际照料子孙会给子女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宋璐等, 2016);而给予经济支持也可能会滋生子女啃老陋习等(伍海霞, 2015)。在此背景下,非常有必要探究教育在当前的代际支持和养儿防老中的作用,尤其分析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或照料子孙支持是否真的有效。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H<sub>2</sub>: 在教育保障当期代际相互支持中,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支持并非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益。

鉴于互惠和均衡是代际支持关系健康持续的关键,不仅关系到家庭纽带的持续,更关系到互动双方的身心健康和福祉。但已有研究缺乏从此角度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内在作用机制,且局部的研究也受限于小型的调查或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推广性有待考究。在中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和结构方程模型,并基于以上两个研究假设深入分析教育如何从代际社会交换增加其对养儿防老的保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重要意义。

### 三、数据和研究设计

#### (一)数据与指标选择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该调查从2008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主要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追踪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该数据的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包含了受访者及其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其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以及与其子女的经济往来和相互支持的信息,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支撑。本文主要关注教育对其养老质量的影响,及其如何通过代际社会交换机制增强其养老质量的保障。

鉴于父母对子女的支持需要健康身体和退休闲暇作为保障，同时因为农村样本居多，故将样本界定为50—75岁的老年人。

因变量为养老质量，主要由物质生活质量、精神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组成。参考已有研究，物质生活质量是指环境提供给人们生活条件的允许程度，包括享有的医疗保障条件、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条件等(Lasheras et al., 2001; 程令国等, 2015); 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是指老年人所拥有、选择、追求和创造的精神资源满足自身精神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状况，一般用老年人的休闲活动参与状况来衡量(Johanne, 2007); 健康状况一般采用老年人的躯体健康、认知功能健康、心理健康和健康自评来评价(Muszalik, et al., 2011)。故将CHARLS数据库中的个人医疗保险、退休金、收入、房产和家庭居住环境等问题指标来衡量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质量; 将参与的休闲活动项目和频率的问题指标来衡量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根据躯体健康、认识功能、心理健康和健康自评的测量题项来判定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自变量为个人教育水平，在探究教育对养儿防老的代际交换机制中，教育经由子代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路径中的相关变量为：子女教育、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同时控制子女的性别、年龄、以及父母的相关特征。在分析教育经由父母对子女支持，进而影响子女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中，相关变量为：个体教育、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帮子女照顾孩子; 相关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婚姻、居住地、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及家庭背景等。具体变量介绍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介绍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养老质量	物质生活质量	连续变量，对个人享有的医疗保险、退休金、家庭居住环境(上网、空气净化器、整洁程度)、房子所有权、收入和存款等题项标准化后相加构建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构建如下：第一，将参与各类保险情况的31个题目加总生成三个等级的参加保险情况指数：1为很少参加保险，2为一般参加，3表示参加较多的保险；第二，将关于退休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等每个月领的钱数的23个题目相加，生成各类退休保险的每月领取额数指数；第三，将个体当前拥有的现钱、存款、债券面值、股票面值等情况的6个问题相加，生成拥有的现钱存款与债券股票指数；第四，由于不同的衡量指数单位不一致，故对以上三个指数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对“您家可以宽带上网吗、是否有空气净化器、室内整洁程度如何、房子所有权、去年收入总和”的5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将衡量老年人物质生活质量的8个指标进行相加，生成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续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精神生活质量	连续变量, 对休闲活动频率和休闲活动情况题项标准化后相加构建精神生活质量指数 <sup>①</sup>
	养老质量 健康状况	连续变量, 对个人的躯体健康、认识功能、心理健康和健康自评的相关题项标准化后相加构建健康指数 <sup>②</sup>
自变量	个体教育获得	教育年限的连续变量
	子女教育获得	教育年限的连续变量
教育经由 子女支持 相关变量	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连续变量, 将子女的户口、婚姻、年收入、房产情况等相关指标标准化后合成子女 SES 指数
	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	连续变量, 每年子女给父母经济支持的总金额
	子女给父母的精神慰藉	连续变量, 主要是指打电话和聊天的次数
父母支持 相关变量	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	连续变量, 每年给子女经济支持的总钱数
	父母帮子女照顾孩子	二分变量, 0 表示不照顾, 1 表示帮忙照顾
控制变量	性别	二分变量, 0 表示男, 1 表示女
	居住地	二分变量, 0 表示农村, 1 表示城镇
	年龄	连续变量, 50—75 岁
	婚姻	二分变量, 0 表示婚姻不完整, 1 表示婚姻完整
	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	分类变量, 1—5 表示健康状况由最好到最差

① 关于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指数的构建如下: 第一, 将过去一个月个体是否参与各类社交活动的 12 个题项相加, 生成三个等级的休闲活动情况指数: 1 表示没有参加休闲活动, 2 表示参加休闲活动, 3 表示经常参加休闲活动; 第二, 将过去一个月个体参加各类活动的频率的 11 个题项相加, 生成三个等级的休闲活动频率指数: 1 表示不经常参加, 2 表示偶尔参加, 3 表示经常参加; 第三, 在此基础上, 分别将休闲互动情况和休闲活动频率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相加, 生成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指数。

② 关于健康状况指数的构建如下: 第一, 躯体健康根据 LADL(器具性日常活动能力)量表计算得出: 0 表示躯体功能不健全, 1 表示躯体功能健全; 第二, 认知功能健康根据国际 MMSE 量表计算得出, 根据问卷中的时间认知、字词识别、记忆自评的问题相加生成三个等级, 1 表示认知功能严重受损, 2 表示认知功能中等或轻微受损, 3 表示认知功能好; 第三, 心理健康根据老年人最近积极、抑郁或焦虑等 10 个衡量心理状态的题项计算得出三个等级: 1 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2 表示心理健康状况一般, 3 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第四, 将自身健康评价的 4 个题项加总分成三个等级: 1 表示健康自评较差, 2 表示健康自评一般, 3 表示健康自评较好; 第五, 在此基础上, 对躯体健康、认知功能、心理健康、健康自评四个指数依次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将其相加生成健康状况指数。



续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控制变量	父亲的最高职业	连续变量, 将父亲从事的职业进行标准化, 合成父亲职业指数
	母亲的最高职业	连续变量, 将母亲从事的职业进行标准化, 合成母亲职业指数
	子女的性别	二分变量, 0 表示女, 1 表示男
	子女的年龄	连续变量, 子女的实际年龄

## (二)描述统计

为了证明家庭代际养老的重要性, 根据调查数据, 首先对受访者养老生活来源状况进行描述。根据调查题目“如果您将来老了干不动了, 您认为您的生活来源主要将是什么?”的描述结果来看, 占 60% 的人认为其养老生活来源为自己的子女。可见通过子女的代际养老仍是当前中国的主要养老方式。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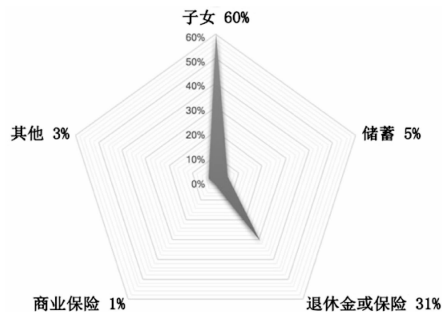


图 1 养老生活来源

基于养儿防老的社会特征, 分析教育如何为养儿防老增加保障的问题, 需分析个人教育水平与养老质量, 以及子女教育与父母养老质量的情况。根据表 2 结果可知, 个人教育水平与养老质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随着教育水平提升, 个体的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依次提升, 且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 子女的教育水平与父母的养老质量也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父母的三类养老质量指标随着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且在不同的子女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2 个体教育、子女教育与养老质量关系的描述统计

	健康状况		物质生活质量		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1)	(2)	(3)	(4)	(5)	(6)
无教育经历	-1.210 (2.355)	-1.214 (2.439)	-0.711 (1.849)	-0.819 (2.180)	-0.350 (1.818)	-0.460 (1.796)
小学及以下	-0.087 (2.397)	-0.639 (2.439)	-0.270 (2.239)	-0.686 (2.262)	-0.136 (1.864)	-0.215 (1.854)
初中及以上	1.219 (2.387)	0.605 (2.502)	0.916 (3.654)	0.631 (3.516)	0.387 (1.822)	0.251 (1.867)
方差分析	2015.72***	708.53***	790.56***	456.33***	358.35***	180.01***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差; 2. t 检验的结果, \*\*\* 0.01 水平显著, \*\* 0.05 水平显著, \* 0.1 水平显著; 3. 表中(1)(3)(5)列表示个体不同教育水平下的养老质量, (2)(4)(6)列表示子女不同教育水平时, 父母的养老质量状况。

### (三) 研究设计

基于代际社会交换的视角, 分析教育如何为养儿防老机制增加保障。需从个人教育与养老质量、教育经由子代教育对养老质量的影响、教育对当期代际相互支持的影响、以及三者相互作用的综合机制来分析。具体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 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来分析。

第一, 从个人角度分析教育对其养老质量的影响, 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为当期的代际相互支持行为做铺垫。模型如下:

$$LQ_i = \beta_0 + \beta_1 E_i + \sum_{n=1}^n \varphi_n X_{in} + \mu_i \quad (1)$$

其中,  $LQ_i$  表示个体养老质量, 分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三个维度。  $E_i$  表示个体的教育,  $X_{in}$  指影响个人养老质量的一些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居住地等, 因为个体健康、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可能受童年时期的健康和家庭背景影响, 因此, 将个人 15 岁及以前的健康状况和父母的最高职业纳入控制变量,  $\mu_i$  表示残差项。

第二, 从教育经由子女教育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角度, 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长期代际社会互换。不仅需要分析个人教育对子代教育的影响, 还需分析子代教育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以及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 进而分析子代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来估计每条影响路径, 具体模型如下:

$$\text{模型二} \begin{cases} LQ_i = \beta_{00} + \beta_{01} X_{cp} + \sum_{m=1}^m \eta_m X_m + \mu_{00} & (2-1) \\ X_{cp} = \beta_{10} + \beta_{11} SES_c + \sum_{q=1}^q \kappa_q X_{cp} + \mu_{10} & (2-2) \\ SEC_c = \beta_{20} + \beta_{21} E_c + \sum_{r=1}^r \lambda_r X_{rp} + \mu_{20} & (2-3) \\ E_c = \beta_{30} + \beta_{31} E_i + \sum_{l=1}^l \phi_l X_{cl} + \mu_{30} & (2-4) \end{cases}$$

其中,  $E_i$ 表示个体的教育,  $E_c$ 表示子女教育,  $SES_c$ 表示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X_{cp}$ 表示子女对父母的支持, 包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  $LQ_i$ 表示父母养老质量。而  $X_{cl}$ 、 $X_{rp}$ 、 $X_{cq}$ 和  $X_m$ 分别为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影响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代对父母支持、影响个人养老质量的一些控制变量;  $u_{00}$ 、 $u_{10}$ 、 $u_{20}$ 、 $u_{30}$ 表示残差项。

第三, 从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角度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 主要是个体教育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和物质生活条件, 而物质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可以对子女进行经济支持, 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可以照顾子孙, 进而提升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以增进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 提升父母的养老质量。由于第一部分已经估计个人教育对其老年健康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部分主要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依次估计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养老支持的影响, 以及子女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text{模型三} \begin{cases} LQ_i = \beta_{40} + \beta_{41} X'_{cp} + \sum_{r=1}^r \nu_r X_r + \mu_{40} & (3-1) \\ X'_{cp} = \beta_{50} + \beta_{51} SES'_c + \sum_{t=1}^t \xi_t X_t + \mu_{50} & (3-2) \\ SES'_c = \beta_{60} + \beta_{61} SES_i + Provide_i + \sum_{s=1}^s \omega_s X_s + \mu_{60} & (3-3) \end{cases}$$

其中,  $SES_i$ 表示个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Provide_i$ 表示对子女照顾孙子女的支持;  $X'_{cp}$ 表示接受父母支持后增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子女对父母的支持,  $LQ_i$ 表示个人养老质量。  $X_s$ 、 $X_t$ 和  $X_r$ 表示影响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对父母支持、影响个人养老质量的一些控制变量;  $u_{40}$ 、 $u_{50}$ 和  $u_{60}$ 表示残差项。

第四, 以上影响路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在复杂的家庭养老系统里, 他们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为了探究教育与养儿防老的良性循环系统, 在各条路径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综合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模型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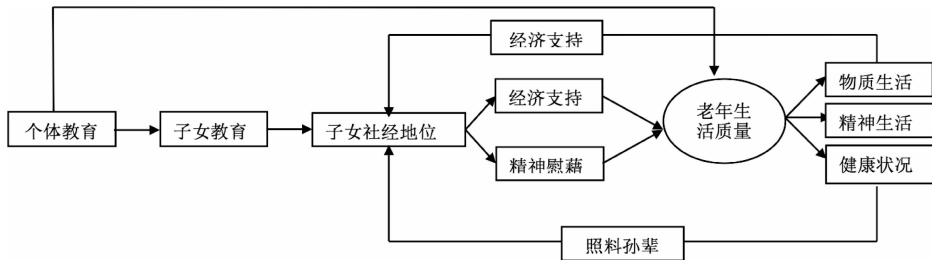


图 2 教育与养儿防老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结构方程模型图的含义为个体教育影响其养老质量，而老年的物质生活质量影响其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健康状况影响其对孙辈的照料情况，通过经济支持和时间支持促进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增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从而提升其养老质量。另一方面，个体教育影响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影响父母的养老质量。两者综合作用，进而分析教育与养儿防老的系统关系。

## 四、实证分析

### (一) 教育获得对个人养老质量的影响

为了探究教育获得对中国养老质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本部分在模型一的基础上，采用 OLS 回归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表 3 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个人性别、年龄、居住地、出生地、户口、婚姻、父母职业以及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后，发现个人教育对其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 0.165、0.146 和 0.071，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此部分的估计结果与描述统计分析部分相一致，说明教育会对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在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越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拥有较高的收入和储蓄，使其老年时期享有充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住房等物质生活条件。在预算约束宽松的前提下，他们享有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和营养水平，并善于调节自己的健康行为，进而获得良好的健康状况(程令国等，2015)。此外，也可能是教育能丰富个人的认知和社会网络资本，使其更愿意参与精神文化活动，进而提升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表3 教育对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

	健康状况	物质生活质量	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个人教育	0.165*** (0.004)	0.146*** (0.005)	0.071*** (0.003)
性别(女=1)	-0.613*** (0.036)	0.102** (0.042)	0.061** (0.028)
出生年份	0.052*** (0.002)	0.0125*** (0.002)	0.0132*** (0.002)
居住地(城市=1)	0.728*** (0.035)	1.274*** (0.041)	0.276*** (0.028)
个人出生地(变更=1)	-0.066* (0.034)	-0.072* (0.040)	0.067** (0.027)
个人婚姻(完整=1)	0.414*** (0.040)	0.408*** (0.047)	-0.115*** (0.032)
15岁及以前的健康状况	0.115*** (0.012)	0.083*** (0.015)	0.065*** (0.010)
样本量	26394	26394	26394
调整的 R <sup>2</sup>	0.188	0.106	0.037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2. t 检验的结果，\*\*\* 0.01 水平显著，\*\* 0.05 水平显著，\* 0.1水平显著。

## (二) 投资子代教育对养老质量的影响

教育不仅直接对个人养老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有着养儿防老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教育还会通过影响子代教育对其养老质量产生影响。为了明晰个人教育怎样影响子代教育进而对其养老质量产生影响的途径，本部分在模型二的基础上依次估计这条影响路径。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

首先，在控制父母与子女的关键特征后，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318( $p < 0.01$ )；表明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更倾向于投资子女的教育，保障子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其次，进一步探究子女的教育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控制父母与子女的关键特征后，发现子女的教育对其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23( $p < 0.01$ )；表明投资子女教育是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关键因素。再次，为验证通过投资子女教育，让其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后，是否会增加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在控制关键特征后，以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和精神慰藉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3和0.061,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教育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水平就越高。同时也发现子女教育也会直接影响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最后,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分别对父母养老生活质量的三个指标进行回归,发现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均对父母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and 物质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进一步从经济养老和心理养老的角度说明了养儿防老体制的重要性。

表4 教育经由子代教育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路径分析

	子女教育	子女社会经济地位	给父母的经济支持	给父母的精神慰藉	父母的健康状况	父母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父母物质生活质量
子女教育	0.123*** (0.004)		0.0002*** (0.000)	0.037*** (0.003)			
父母教育	0.318*** (0.007)						
子女社会经济地位			0.0003*** (0.0001)	0.061*** (0.008)			
给父母的经济支持					1.043 (1.520)	2.650** (1.263)	7.213*** (1.856)
给父母的精神慰藉					0.146*** (0.013)	0.0404*** (0.011)	0.194*** (0.016)
相关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9,259	19,030	16,431	16,500	16,431	16,431	16,431
调整的R <sup>2</sup>	0.230	0.261	0.016	0.107	0.235	0.045	0.157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2. t检验的结果,\*\*\*0.01水平显著,\*\*0.05水平显著,\*0.1水平显著;3. 限于篇幅,相关的控制变量,如父母性别、父母年龄、父母居住地、父母户口和婚姻、以及子女的性别和年龄等变量的估计系数没有一一报告,如需请联系作者。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子女的经济支持并非对父母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老年父母存在较强的自尊心,接受子女的经济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其自我感觉无用,加快年迈父母的社会衰竭,不利于其健康状

况。如果是此类情况的话,子女在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时候需要关注老年父母的需求与心理特征,用正确的方式给予父母经济支持。但也有可能是中国的父母爱子心切,会心系子女的经济生活状况,一般不会将子女给其的钱用于健康投入,省吃简用,以期望为子女需用钱时提供帮助,但这需要进一步验证。

### (三) 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对养老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部分根据模型三估计父母与子女代际社会交换对其养老生活质量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在控制相关影响变量后,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对照顾孙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15( $p < 0.05$ );父母的物质生活质量对其基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11( $p < 0.01$ ),验证了父母健康和富有是其对子女支持的保障。

其次,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子女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299( $p < 0.01$ );但父母照料孙辈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的正向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父母给予子女的资金可以直接提升子女的收入,子女可以将多余的资金用于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的投入,以增加其社会经济地位。但父母照顾孙辈,一方面是可以减轻子女照料孩子的负担;但是也会增加子女家庭的生活成本,因为老年父母有基本的生活成本和潜在的医疗保健成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增加子女照顾家庭的精力,因为需要同时处理夫妻关系、父母关系、子女关系,当精力分散过多时,将会对其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当后两者的成本大于前者受益时,照料子孙并不能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再次,加入父母照顾子孙和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后,和表4相比,发现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系数提高,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68和0.065;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年老父母对子女给予支持可以增加子女对其的养老支持。

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子女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发现子女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文化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教育经由代际相互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有利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控制了父母对子女的精神支持和照顾子孙的变量后,发现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不仅能增加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还能增加子女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同时,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本身也会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各项指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成年子女与父母间经济互助的交换动机假说(Donald and Mark, 1992)。但子女的经济支持却对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和第二部分的结果相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父母爱子心切,会心系子女的经济生活状况,更渴望为子女付出,而不是接受子女的帮助。老年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增加自身的精神负担,并不利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提升;相反,能为子女贡献晚年“余热”,照顾子孙和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等被“啃老”行为更能提高部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孙鹃娟、冀云(2017)的研究一致,父母在家庭中对子女适量的支持行为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老当益壮的心理状态下,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也可能会损害老年人的自尊心,使其产生无能感、失败感、负疚感,损害其心理健康,会产生社会衰竭。

此外,还发现父母照顾子孙并不会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照料孙辈也不会显著增加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在对父母的养老质量影响中,仅对父母的健康状况产生有益的影响,对父母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还发现当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后,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影响消失。这和Hjälml(2012)关于“时间—金钱”互惠模式的代际交换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虽然教育能增加父母照料孙辈的能力,但照料子孙并非明智之举,因为既不有益于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会牺牲父母提升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时间,降低父母的养老质量。

#### (四)教育增加养老质量保障的综合作用机制

以上部分不仅从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视角验证了教育经由代际交换影响养老质量,也从长期的代际社会交换视角验证了教育经由投资子代教育影响养老质量。在复杂的家庭养老系统里,综合分析当期和长期代际社会交换是探究教育与养儿防老的良性循环系统的关键。因此,本部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综合分析教育如何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

根据已有研究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养老质量设置为潜在内因变量,由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这三个观测变量生成。个人教育、子女教育、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的精神慰藉、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照顾子孙均为观测变量。根据stata14.0中SEM报告的相关结果,进行不断调整。根据原模型图的分析结果为RMSEA的统计结果为0.059,大于0.05;绝对拟合优度指数CFI为0.807,小于0.900;卡方自由度比值为 $3215.23/31=103$ 。均表明模型拟合效果不好,需进一步调整。



表 5 当前的代际社会交换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

	照顾子孙	给孩子经济支持	子女社会经济地位	给父母的经济支持	给父母的精神慰藉	父母健康状况	父母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父母物质生活质量
健康状况	0.015*** (0.003)							
物质生活质量	0.011*** (0.002)							
子女社会经济地位			0.068*** (0.033)	0.065* (0.035)				
给子女经济支持		0.299*** (0.090)	0.706*** (0.072)	-0.039 (0.075)	0.227*** (0.084)	0.736*** (0.163)	0.202*** (0.071)	
照顾子孙		0.188 (0.145)	-0.034 (0.080)	-0.073 (0.083)	0.286** (0.141)	0.245 (0.273)	-0.074 (0.119)	
子女的精神慰藉					0.351*** (0.103)	0.129 (0.200)	0.207** (0.087)	
子女的经济支持					14.969 (15.457)	74.430** (29.880)	31.816** (13.024)	
相关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5680	16991	18091	15181	15237	15181	15181	15181
调整的 R <sup>2</sup>	0.064	0.028	0.200	0.026	0.110	0.236	0.155	0.155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2. t 检验的结果,\*\*\*0.01 水平显著,\*\*0.05 水平显著,\*0.1 水平显著。3. 限于篇幅,相关的控制变量,如父母的性别、年龄、教育、户口、婚姻、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以及子女的性别和年龄等特征的估计系数没有一一报告,如需请联系作者。

根据报告结果的调整指示,子代教育和子女的精神慰藉关联后,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RMSEA=0.037$ , 小于  $0.050$ ; 绝对拟合优度指数  $CFI=0.930$ , 大于  $0.900$ , 这些指标均达到了可接受范围之内。综合  $RMSEA$ 、绝对拟合指数和样本量,界定本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具体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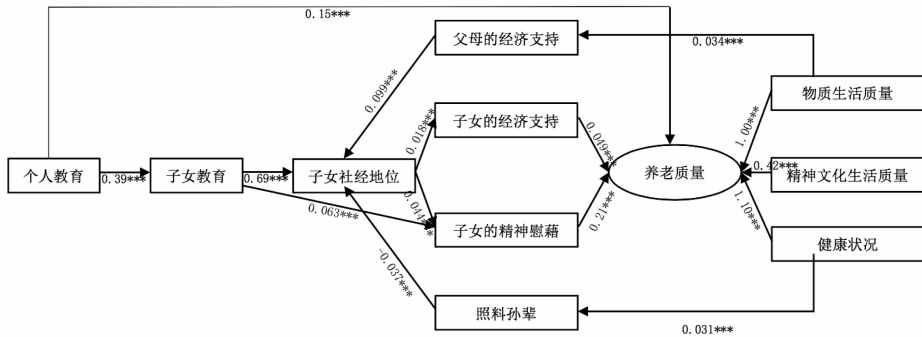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交换本质下教育与养儿防老的作用机制图

关于测量模型的结果,潜在内因变量养老质量和观测变量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及健康状况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依次为  $1.00$ 、 $0.42$  和  $1.10$ , 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养老质量与身心健康、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关联密切,其中健康的身心尤为重要,是保障其生活质量提高的基础,只有健康的身心 and 充足的物质生活,老年人才会更加充分的享受精神文化生活。

关于结构模型的测量结果,发现个人教育对养老质量的影响、老年经济状况对其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以及健康状况对照顾孙辈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再次验证了教育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为其对子女提供支持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和身体保障。进一步,发现父母支持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系数中,照顾子孙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照料子孙策略的无效性,表明在家庭内部代际相互支持中,父母直接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可能对家庭的整体运作更有利。因为父母在照料孙辈时若缺乏新的育儿理念,可能也会增加子女家庭关系处理的精力,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并不十分有益。

另一方面,在长期代际交换中,个人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子女教育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会对子女的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有利影响。进一步发现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的影响系数,以及子女教育对父母精神慰藉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验证了子女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是保证其对父母有效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子女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

发现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对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0.049 ( $p < 0.01$ ), 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养老质量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21 ( $p < 0.01$ ), 体现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养老质量影响更大。

以上分析反映了教育经由当期的代际交换支持和长期的投资回报支持, 对父母的养老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父母的养老质量影响更大。因此, 教育会通过当期的代际社会交换和长期的代际社会交换对养儿防老增加保障, 验证了社会交换本质下的教育与养儿防老的关系。

##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2014年的数据, 本文发现个人教育不仅会经由投资子代教育和子代长期的养育回报增进其养老生活质量, 也会经由保障父母对子女的支持, 增加子女的养老支持, 进而增加父母养老生活质量; 显示了代际社会交换本质下教育对养儿防老的双重保障机制。但是在这个良性养老保障机制中, 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虽然教育具有代际收益, 能保障子女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增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 进而增加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体现了子女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对于增进养儿防老保障的重要性。但子女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的健康状况影响效应要小于精神慰藉的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孤独问题凸显背景下, 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中国式”父母更希望得到子女的精神关怀。同时, 也可能是因为在身体衰落的过程中, 老人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敏感, 子女的直接经济支持可能会损害其自尊心, 增加其“社会衰竭感”。因此, 在对老年父母养老支持时, 需充分关注老人心理需求。

第二, 虽然教育能增进老年父母的健康、财富和闲暇, 进而为其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子孙提供保障。但给予照料子孙和经济支持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 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不仅能增加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也会增加子女对其的经济支持, 验证了父母与子女间经济互助的交换动机假说。而帮忙照料子孙并不能提升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没有影响。可见“时间—金钱”互惠的代际交换模式并不能得到验证。即教育能增加父母照料孙辈的能力, 但照料子孙并非是明智之举, 因为既不能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有益, 同时也会牺牲父母提升养老质量的时间和资本, 不利于养老质量的提升。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给予子女经济支持能对老年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会对其健康产

生显著影响；验证了“中国式”父母更渴望为子女付出，避免社会衰竭，而不是接受子女的经济帮助。

基于本文的以上研究结果，建议在我国老龄化的背景下，重视教育对代际良性养老系统的影响机制，从优化家庭内部投资、促进家庭代际优势累积方面应对老龄化问题。

首先，教育能通过影响当期和长期的代际交换提升父母的养老质量。一方面，教育增进老年健康和富有的同时，增加了其对子女的支持和子女的养老回报，不仅使其老有所值，更会老有所依。从这个角度讲，可注重老年余热的发挥，增进子女优质养老的动力。健康富有的父母在退休后，给予子女支持，不仅可以避免其社会衰竭，增进其“老当益壮”的价值感，还能减轻子女养老负担，为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优势资源积累提供保障，使得子女养老动力更加充足。另一方面，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能提升子女的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增加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进而保障父母晚年的物质充足和精神愉悦。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重视教育的终身受益和代际收益，积极实行教育兴国战略，并普及个人注重家庭教育投资的理念。

其次，针对教育增加子女养老支持时，出现子女精神慰藉对父母健康影响更大、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会对自身健康产生有利影响的情况，需认真分析父母心理需求，进行有效的养老支持。针对父母担心接受子女经济帮助会产生自我无用、社会衰竭的心态，或父母给予子女支持能增进自身价值感的情况；子女在给予父母经济支持时，需要关注老年父母的需求与心理特征，用正确的方式给父母经济支持。同时，子女的精神慰藉是父母养老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少子化和老人孤独问题严重的背景下，除了完善社会养老保障系统外，还需充分挖掘子女养老的重要性，注重培养子女的孝顺观念，鼓励子女通过通信技术和实际陪伴的方式关注父母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动况，增加老年父母的幸福度。

最后，照料子孙并不能提升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削弱父母养老的时间和资本，但父母直接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对家庭的整体运作有利。针对此类情况，可建立公共的婴幼儿抚育体系，让科学的人员养育下一代，以保障成年子女能安心工作。同时，针对想发挥“余热”的老年父母，可充分发挥教育的理性分析功能，用最合适的方式给予子女支持，不仅能提升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可保障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确保在互惠和均衡的代际相互支持中，促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和谐互助，进而保障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持续提高。

## [参考文献]

- 陈皆明, 1998:《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程令国、张晔、沈可, 2015:《教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来自中国老年人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期。
- 郭丛斌、闵维方, 2011:《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第9期。
- 何圆、王伊攀, 2015:《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黄庆波、胡玉坤、陈功, 2017:《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人口与发展》第1期。
- 江克忠、裴育、夏策敏, 2013:《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证据》,《经济评论》第4期。
- 刘西国, 2016:《基于Heckman-HLM模型的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第11期。
- 罗伯特·帕特南, 2017:《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沈咪, 2013:《高等教育投资与农村家庭养老的相关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石智雷, 2015:《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宋璐、李亮、李树茁, 2016:《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对农村家庭代际矛盾的影响研究》,《心理科学》第5期。
- 孙鹃娟、冀云, 2017:《家庭“向下”代际支持行为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兼论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人口研究》第6期。
- 伍海霞, 2011:《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人口与发展》第1期。
- 伍海霞, 2015:《啃老还是养老? 亲子同居家庭中的代际支持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科学》第11期。
- 熊波、石人炳, 2016:《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基于老年父母视角的考察》,《人口学刊》第5期。
- 叶晓梅、梁文艳, 2016:《教育能增进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吗?——基于CLHLS 2005—2011面板数据的证据》,《教育经济评论》第4期。
- 余梅玲, 2015:《代际交换:农村家庭养老的过程研究》,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郑丹丹、易杨忱子, 2014:《养儿还能防老吗——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代际支持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Adams, S. J., 2002,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 Older Adults”, *Education Economics*, Vol. 10(1), 97–109.
- Black, S. E., P. J. Devereux, and K. G. Salvanes, 2005, “Why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1), 437–449.
- Cheng, C., 2017, “Anticipated Support from Children and Later-life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17(9), 201–209.
- Cong, Z., and M. Silverstein, 2008,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Vol. 5(1), 6–25.
- Cutler, D. M., and A. Lleras-Muney, 2010,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Health Behaviors by Educatio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Vol. 29(1), 0–28.
- Dawalibi, N. W., R. M. Goulart, and L. C. Prearo, 2014, “Factor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Programs for Senior Citizens”, *Ciência & Saúde Coletiva*, Vol. 19(8), 3505–3512.
- Donald, C., and R. Mark, 1992, “Inter-vivos Transf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Vol. 74(2), 305–314.
- Doorslaer, E. V., X. Koolman, and A. Jones, 2010,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in Income-related Health Inequalities across European Countries”, *Health Economics*, Vol. 13(7), 609–628.
- Fan, Y., 2016,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51(16), 301–316.
- Fingerman, K. L., K. Kim, P. S. Tennant, K. S. Birditt, and S. H. Zarit, 2015,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a Daily Context”, *Gerontologist*, Vol. 56(5), 896–908.
- Gokkaya, N. O., and Y. Gokce, 2012, “Pain and Quality of Life (QoL) in Elderly: The Turkish Experience”,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Vol. 55(2), 56–63.
- Grossman, M.,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Schooling: What’s New?”,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 3(1), 7–17.
- Hjälml, A., 2012, “Because We Know our Limits: Elderly Parents’ Views on Intergenerational Proximity and Intimac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Vol. 26(3), 296–308.
- Johanne, D., 2007, “Ag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Disability & Rehabilitation*, Vol. 28(4), 221–230.
- Lasheras, C., A. M. Patterson, C. Casado, and S. Fernandez, 2001,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Diet,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an Elderly Spanish Community Population”,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Vol. 27(3), 257–270.
- Luccas, L. M., L. Lautert, and E. F. Hilleshein, 2011, “Quality of Life and Voluntary Work among the Elderly”, *Revista Da Escola De Enfermagem Da U S P*, Vol. 45(3), 663–669.

- Martin, F. L. G. , 1999,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Trends in Functional Limitations among Older Americans”, *Demography*, Vol. 36(4), 461—473.
- Mazzonna, F. , 2014, “The Long Lasting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Old Age Health: Evid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101, 129—138.
- Momtaz, Y. A. , R. Ibrahim, and T. A. Hamid, 2014, “The Impact of Giving Support to Others on Older Adults’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Psychogeriatrics*, Vol. 14(1), 31—37.
- Muszalik, M. , A. Dijkstra, K. Kędziora-Kornatowska, H. Zielińska-Więczkowska, and T. Kornatowski, 2011, “Independenc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Arterial Hypertension in Fulfilling Their Needs, in the Aspect of Functional Assess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QoL)”,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Vol. 52(3), 204—209.

## How Does Education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Old-age?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Exchange Theory

YE Xiao-m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Economics,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the lifetime benefits and non-material benefits of education deserve attention.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ens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change. Using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data (CHARLS 2014—2015), we find that education attainment will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old-age through the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the current and the long-term. On the one hand,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lderly’s health and quality life which ensure economic and time support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hen increase the support of their children for old age. On the other hand, education attainment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ld-age through their offspring’s education and the long-term return of thei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it wa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support of children had less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parents than the role of spiritual consolation. While raising by grandparents will reduce the parents’ life quality. Therefore, whe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virtuous circle mechanism of educ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ildren’s spiritual comfort to the parents and use the role of education to optimize the collaborative approach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support.

**Key words:** education attainment; the quality of old-age; raising children for old age;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责任编辑: 杨娟 责任校对: 杨娟 胡咏梅)